

文明溯源视域下城市演化、文化滋养与价值重塑

——以长江文化与武汉为例

王光艳*

摘要: 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根基。在文明溯源视域下,城市演化、文化滋养与价值重塑构成城市文明传承发展的核心逻辑。本文以武汉为例,系统梳理其从张西湾城址的城市萌芽、盘龙城遗址的城市之根,到却月城与夏口城的中心城区肇始、州府治所时期的工商繁兴,再到近现代开放发展的现代化转型全过程,揭示武汉完整见证中国城市形态四阶段演化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长江文化对武汉的多维滋养:既延续其千年文脉,赋予其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又锻造其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彰显城江共荣的发展内核。最后,结合文明溯源成果与武汉文化资源禀赋,从溯源研究、系统保护、项目落地、创新发展、文旅融合五大维度,提出武汉城市价值重塑的具体路径,为长江文化传承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长江文化 文明溯源 武汉 城市演化 文化滋养 价值重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1]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重要标志体现在多个维度,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创造,也涵盖制度、精神等非物质层面的成就。城市则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文明发展的根基,文明是文化发展的果实”^{[2][11]},以文明探源成果为基础,从文化角度研究城市演化进程对于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意义重大。在文明溯源视域下,城市演化、文化滋养与价值重塑紧密相连,共同推动着城市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武汉是中国唯一经历了邑制城市—郡县城市—工商市镇—现代都市四个历史阶段的城市,没有之一”^[3],因此,将武汉作为案例研究城市演化具有典型性。本文以武汉为例,从城市演化、文化滋养两个方面,梳理城市文明起源与

* 王光艳,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410486810@qq.com。

本文系湖北省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课题“湖北考古新发现对长江文明历史脉络的重构及其贡献研究”(HCYK2025Y06)、2026年度武汉市委市政府重点课题“武汉英雄城市精神历史谱系研究”(ZD2026)以及“文旅融合提振武汉城市消费的机制与路径”(ZD2026004-1)的阶段性成果。

演进历程，提出重塑城市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一、文明缩影：武汉城市演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城市历史可以上溯至商周时期，大致沿着邑制城市、郡县城市、工商城市、现代都会的路径演化发展。城市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其演化过程深刻反映了文明的变迁。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完整地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城市历史的四个不同阶段和四种城市形态，在不同的时间层次把一个个世代的具体特征都依次贯穿起来了，一部武汉城市史，无疑就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写版”^[3]。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亚洲最长的河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作为长江流域代表性城市，武汉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研究武汉城市演化过程，对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一）张西湾城址：武汉地区城市萌芽

城市起源与农业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细化密切相关。距今5万至1万年前，“汉阳人”^①在武汉纱帽山生活，这是迄今为止武汉地区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距今8000年至6000年前，东湖放鹰台遗址留下了粳型稻的稻壳烧土、陶片、石斧、石锛和鱼叉，表明水稻种植已在此流行。

从石家河文化早期开始，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结构逐渐复杂化。距今4300年前，古人在黄陂境内建造张西湾城，遗留下张西湾城址。“张西湾城址面积达98000平方米，……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以夹砂黑、灰陶为主，包括宽折沿大口罐、鸭嘴形鼎足、红陶高圈足杯、宽折沿罐、厚胎喇叭形杯等。”^[4]长江中游发现的城址聚落多以城址为中心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聚落群，张西湾城址周边没有发现同时期附属聚落或遗存，显示出这里聚落等级体系相对简单。

“张西湾城址被初步认定为武汉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城址”^[4]，比盘龙城遗址早七八百年。张西湾城址“兴起于石家河文化早期”，“至石家河文化晚期，城址便完全遭到废弃”^[5]，延续时间约100年。包括张西湾城址在内的长江中游其他史前城址的废弃时间相近，“几乎同时废弃于石家河文化晚期”^[6]，显示出当时社会结构或自然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才使得这些城址同时被弃。

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文明“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7] 81}，张西湾有城垣与壕沟，属于史前聚落城址，迄今未见文字和金属遗存，尚未进入文明阶段。

（二）盘龙城遗址：武汉城市之根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代，农业从采集狩猎中独立出来，形成稳定的粮食生产体系；农业与手工业分离，剩余产品出现，物物交换日益频繁；青铜器生产系统化，阶级进一步分化；这些变化催生了城市。

盘龙城体现了从原始聚落到邑制城市的演进。“盘龙城扼长江中游，居南方通中原的要冲”^{[8] 117}，“约公元前17世纪的夏代晚期，第一批先民来到盘龙城定居”^[9]，形成了聚落。“二里头文化晚期，

^①“汉阳人”头盖骨于1999年在汉阳纱帽被发现，是距今5万至1万年前的女性化石，为晚期智人类型。详见皮明麻，陈钧，李怀军，等《武汉通史精要连载之一 沧海桑田 文明曙光——从“汉阳人”到三苗》，《学习与实践》2005年第3期。

中原文化经汉水通道和豫南一带进入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并以长江沿岸为通道逐步向周边扩张。”^[8]公元前16世纪,商汤兴兵南征江汉,击败荆楚部落,占领云梦泽周边区域。距今3500年前,商王朝建造盘龙城,“盘龙城是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南扩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建成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9],以此为基础扩张,“深入到今江西、湖南境内”^[10]。盘龙城对南方地区融入以夏商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系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盘龙城遗址规模宏大,内城总面积75400平方米,城址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周长1100米,包括宫殿区、居民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等部分。遗址周围还发现多处墓地,其中包括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盘龙城展现了商代“邑制城市”风貌,“将武汉城市起源定格在3500年前”^[11]。

“从中原文化进入的结果来看,中原势力在东部地区显示出有效的控制力和持续的影响力,而在西部地区虽然保持了文化影响上的持续性,却始终未取得文化性质上的主导地位”^[12],中原王朝对包括盘龙城在内的西部地区除资源掠夺外,并未进行强力统治。商代中期偏晚,盘龙城和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一大批关联次级城市遭到废弃,原因很可能是文化激烈冲突。尽管如此,盘龙城因商代中心城市地位和邑制城市特色,成为武汉城市之根。

(三) 却月城、鲁山城、夏口城:武汉中心城区肇始

城市是人口密集、功能分化的永久性定居点,是“城”与“市”的结合。秦汉以降,郡县制确立,城邑完成职能分化。县城普遍具有城墙防御系统、官署行政机构和市场经济功能,与早期单纯居住功能的邑形成鲜明对比。

武汉地方建制始于西汉,为江夏郡沙羡县地。“风云际会中,三国历史人物在武汉粉墨登场,因战争杀伐而开启武汉城区范围内城市建设的全新篇章。”^[13]公元192年,汉献帝权臣李傕以刘表为荆州牧,“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14]。却月城依托龟山屏障建造,是武汉中心城区已知的建造时间最早的城市。却月城位于汉水北面,“与汉阳鲁山城隔汉水相对,共同构成汉水航道锁钥”^[15]。“公元223年,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鹤矶上修筑了一座瞭望塔——黄鹤楼。”^[16]武汉中心城区长江两岸对峙的两座城池相继建成,主要发挥军事防御功能。南朝时,刘宋将夏口城扩建为郢州,成为郢州的州治所在地。此后,齐、梁、陈均以此城为郢州州治,夏口城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官衙、府邸等建筑增多,居住空间扩大,形成生活区。

隋朝将行政区划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今武汉地区设置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以武昌、汉阳为治所,从军事城堡发展为县级行政中心。以铁门关来管窥城市变化,可见一斑。公元621年,汉阳城改建为砖城,城墙牢固,铁门关的军事防御功能减弱,逐渐转变为文化经贸通道。武汉地区城市也从军事防御城堡,扩展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的郡县城市。

(四) 州府治所:武汉地区工商繁兴

工商业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发展,对城市演变影响极大。唐代,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升格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所在地,城市形态多样化,呈沿江拓展之势,四方人口汇聚,工商市镇兴起。

唐朝采用“道州县”三级制,“道”主要是监察区,行政功能较弱,“州”是基本行政区划单位,地

位较高的“州”称为“府”。鄂州是军事重镇与东南巨镇，鄂州港埠齐备，转输贸易发达，与扬州、益州、江陵并称长江四大商港。宝历年间(825—826年)牛僧孺以砖结构重筑鄂州城垣，周长约15里，设州治、漕司等官署。城外滨江地带为南草市等商业集市，形成“内城政治、外城商业”的布局。汉阳城背靠龟山，东临长江，北接汉水，是船只必经之地，逐渐发展为商贸重镇与交通枢纽。鹦鹉洲一带成为长江商船集散中心，是“东南巨镇”的商贸标志区。“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13] 105}，诗人们沿长江或汉水而下，到达武汉地区。李白登临黄鹤楼，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武汉由此获“江城”之名，也可管窥当时市井繁华。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军。南宋将领岳飞驻防鄂州七年，“力行军民屯田营田，鼓励垦荒种植，大量吸收北方战乱流民定居并从事农商业，有效稳定了武汉地区的人口数量和经济社会的持续性发展”^[14]。公元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

成化年间，汉水从龟山以南改道至龟山以北。嘉靖年间，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因其非行政中心和突出的商业中心功能等有别于传统郡县城市的异质另类特性”^[3]而快速发展。明代武汉城区分属武昌府和汉阳府，茶叶是武昌府重要商品资源，“武昌府土产中有火纸、皮纸、竹纸的种类，都已开始批量化生产”^{[13] 15}，武昌府城关镇、金口镇、鲇鱼口镇成为繁华集市。汉阳府在农业和渔业基础上，纺织业、制陶业、酿酒业等传统手工业兴起，商品经济发达，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提速，为明清时期“汉口镇”的崛起奠定基础。“自明代中期开始，‘湖广熟，天下足’逐步取代了自宋以来的‘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13] 20}明末清初，中国形成了一批商业中心，汉口成为“天下四聚”，名列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中国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11]。

(五) 开放发展：武汉城市现代化转型

进入近现代，武汉地区城市从隔江分治走向聚合，从内陆城市走向沿江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城市，成为现代都会。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天津条约》，“依据该规定，为了英国船舶运输货物之便，清政府在长江流域开放了通商口岸”^[14]。1861年3月，汉口开埠通商，被迫对外开放。英、德、俄、法、日等列强纷纷来到汉口开辟租界，使租界成为所谓“国中之国”。1899年，清政府设夏口厅，隶属汉阳府，治所为今汉口地区。自此，汉口、汉阳、武昌都有独立行政建制，统称“武汉三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布脱离清政府。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将三镇合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武汉三镇”的建制屡变。

晚清民国时期，武汉城市发展迅猛。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武昌、汉阳创办各类官营新式工厂、新式学堂，中国早期工业化在此起步。平汉铁路、粤汉铁路相继修建，武汉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汉口商业街区规模超过许多省会城市，茶叶、桐油、药材等大宗商品的交易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汉口茶市的行情甚至直接影响国际茶叶市场价格。汉口码头每日停泊船只数以千计，商帮云集，会馆众多，商业发达。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武汉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租界区出现了大量西式建筑，西方现代城市理念被引入，市政建设中采用碎石马路、煤气路灯、自来水等，城市功能更加多样，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武汉成为中国内陆规模最大、人口密集、经济

发达、交通便利的中心城市，‘被中外人士美称为‘东方芝加哥’”^[9]。

1949年5月16日，三镇解放，武汉回到人民怀抱。同年，武昌市、汉口市和汉阳县合并为武汉市，由中央人民政府直辖。1954年，武汉成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1992年7月，武汉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原则同意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25年2月，国务院关于《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批复中明确，武汉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新中国成立至今，武汉在经济、产业、交通、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等多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GDP是1949年的6100多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从传统工业主导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转变；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交通枢纽升级，综合交通体系完善，跻身世界级“地铁城市”。武汉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的杰出代表。

二、强基铸魂：长江文化对武汉的滋养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赋予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活力。武汉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与长江的关系紧密而特殊。长江文化深刻影响了武汉城市文明的演进，并推动其现代化发展。

（一）历史传承：长江成就武汉千年不绝文脉

长江哺育了武汉先民，创造了武汉的远古文明。云贵高原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从云贵高原逐渐向长江下游和黄河流域扩散、迁徙^{[10][14]}。长江及其支流汉江为武汉地区提供了充沛的水源，使得先民得以在此定居并发展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武汉地区先民已经掌握水稻种植技术和陶器制作工艺。张西湾城址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水平。盘龙城实证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明对话，标志着武汉是“华夏文化南方之源”。郭元咀是商代长江流域最大的青铜工厂，展现了青铜时代长江流域的冶炼水平。距今3100年前，楚人南迁建立楚国，开启800年的辉煌，孕育了对武汉影响深远的荆楚文化。文明曙光从长江中游升起，从早期聚落到邑制城市，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体现了长江对武汉的物质馈赠和精神滋养，也展示了武汉先民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跃升。

长江引领着历史创造，留下了城市文明的烙印。长江在形塑武汉经济地理的同时，也在塑造着人文历史。禹稷行宫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大禹的怀念和面对自然挑战时的价值追求；钟子期墓和古琴台承载的知音故事赋予武汉“重情重义”的城市性格；行吟阁因纪念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而成为重要的文化载体；黄鹤楼因李白、崔颢等诗人的咏叹成为“江山诗境”的象征；岳家嘴等地名记载着岳飞北伐抗金的功绩；问津书院沿袭着孔子文脉；古德寺展示了中西合璧的佛教建筑奇观；长春观为著名道教圣地；汉口“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为“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形成了“讲胃口”“搭白算数”的市井文化。汉阳铁厂、京汉铁路、武汉大学等留下了武汉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记忆，将楚人的“实用智慧”与“开拓精神”注入城市血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开启亚洲民主之门，成为楚文化“筚路蓝缕”开拓传统的当代回响；武昌红巷、八七会议旧址、二七纪念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革命遗址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武汉奋斗的历史记忆与革命文化基因；红钢城、汉正街、东湖高新、经开区、中法生态城见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拓展了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内涵。这些符号共同构建了“大江大湖大武汉”的文化象征，承载着长江的文化记忆。

（二）城市精神：长江赋予武汉开拓进取基因

长江奔腾不息，激发着敢为人先的精神。长江是武汉的“生命之脉”，塑造了城市的地理轮廓，更以奔涌不息的姿态将开拓精神注入武汉城市基因。从地理空间来看，武汉地区的城市空间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聚集，即从长江支流向干流迁移，最终融合为大武汉。在长江干流建立城市，需要克服对大江大河的恐惧，并树立治理长江的信心。长江赋予武汉开拓进取的基因，并将“敢为人先”精神贯穿古今。从古代先民在江畔筑城兴业，到近代张之洞以“中体西用”开启中国内陆工业化；从武昌首义打响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到汉正街率先破冰商品流通体制；从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到“武”字头核心工业集群相继建成；从中国第一根光纤在这里诞生，到“光谷”在创新浪潮中崛起——长江始终以奔流向前的姿态，推动武汉不断突破、不断先行。长江孕育了敢为人先的气魄，也滋养了开放包容的胸怀，使武汉在时代的浪潮中一次次站在前列，以创新回应时代，以创造书写未来。

长江不舍昼夜，诠释着追求卓越的精神。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独特的地理格局使其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从古代的“金道锡行”到近现代的交通网络，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物资交换和文化交流的核心节点。长江的奔流不息孕育了武汉“不囿陈规、勇于突破”的特质，长江文化始终是武汉创新发展的精神内核。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东湖实验室、达梦数据等科创机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光谷光电子信息、车谷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武汉国创科光电装备等产业打造全球标杆，重构产业规则。天河—花湖“空铁水”多式联运、阳逻港铁水联运枢纽，实现联动出海，连接全球。同济医院研发全国首个脑出血 AI 专病大模型“脑瑞康”，将多学科会诊时间从 2 小时锐减至 47 秒；全球首个女性肿瘤 AI 大模型“同济·木兰”覆盖全流程诊疗，推动医疗服务智能化，为全国 AI 医疗应用提供“武汉方案”。这些长江文明的“卓越矩阵”，助力武汉在全球城市竞争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兼收并蓄：长江锻造武汉开放胸襟

长江浩荡奔涌，锻造了武汉兼收并蓄的自信。长江决定了武汉地理位置的独特和移民重镇的必然。武汉地处北纬 30 度线，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先秦时期，楚人南下，与当地族群不断交往融合，建立楚国，实现第一次文化大融合。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九次大移民过程中，武汉多次成为移民搬迁的中转站或目的地。武汉移民来源极为广泛，涵盖全国多地。从近现代武汉移民来看，明清时期，徽州、绍兴、广东商人及湖北黄州商人因经商定居汉口，形成早期商业社区。清末民初，山陕、江浙商人聚居汉口，河南灾民因水患迁入。新中国成立后，大量东北人因武钢建设迁入青山，形成工业社区；东西湖围垦时，河南人和周边县市群众前来参加会战，有的留在东西湖，形成农垦大队；改革开放后，高知人才聚集光谷，形成科技社区。移民带来新的文化，传播新的思想，与武汉本土文化交融。移民后代逐渐本土化，同时保留部分原籍文化习俗，形成“包容性身份认同”和融合性习俗。武汉方言属北方话系统，但融合西南、中南地区方言特点；热干面、鸭脖等本土特色与移民带来的风味并存。移民带来的“江湖气魄”与“市井智慧”融合，形成武汉人“豪爽直率、兼容并蓄”的性格特质，既保留码头文化的豪爽，又吸纳现代文明的开放。长江成就了大江大湖大武汉，赋予城市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

长江通江达海，奏响了武汉开放包容的和声。武汉历来站在开放前沿。商周时期，人类沿河而居，使用独木舟、木筏进行渔猎与部落交流。春秋战国，长江、黄河、珠江等主要河流的航运初具规模。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内河航运支撑了庞大船队的物资集散；明中期汉水改道后，汉口成为湖广漕粮转运口岸和“楚商行盐”总口岸。茶叶、粮食、纺织品等通过汉口中转，吸引晋商、徽商等群体聚集。清末，汉口开埠，被动开放，遭受西方文化剧烈冲击。汉口率先引入先进技术，成为国内较早使用电灯、自来水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多次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舞台。自1979年与日本大分市缔结首对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以来，武汉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目前，武汉的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总数超过110个，遍布全球各大洲，其中一些关系尤为密切，成为中外地方合作的典范。武汉的国际友城网络是其对外开放的宝贵财富。从长江之滨走向世界，这些友城不仅是武汉城市国际化的标志，更是其深度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伙伴和桥梁。长江以其浩荡之势与深厚文化底蕴，锻造了武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城市胸襟，使其成为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的核心枢纽与文化交融的典范。

三、以城为基：彰显城江共荣的发展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时强调，要“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8]。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武汉重任在肩，“努力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样板段、长江文化展示阐释核心区、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9]，续写新时代城市发展的辉煌篇章。

（一）推进长江文明溯源研究，赋能武汉城市文化价值实现

第一，持续推进以长江文化阐释为核心的武汉城市文明探源。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武汉地区考古研究工作，联合国内外考古专业机构，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努力破解长江中游文明密码。

第二，探索建设围绕城市历史文脉的武汉长江文化资源数据库。深入开展长江文明探源专题调研，探索建设武汉长江文化资源数据库，推动长江重要文化资源数字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保护工作，建立健全武汉地区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相关名录。

第三，深化长江文化谱系的理论研究，系统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由武汉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企业共同组建长江文化高端智库，构建跨学科、交叉、多元化的创新平台。设立长江文化保护专项课题，扶持长江文化研究，编撰出版长江文明探源与武汉城市发展的研究专著。

（二）加强长江文化系统保护，助力武汉城市文化脉络赓续

第一，统筹开展长江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化对长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律性的认识，构建城乡一体、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分门别类、科学有序、统筹推进长江流域不同类型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编制专项保护实施方案，建设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示范区。

第二，以沿江生态高水平保护带动沿江文化资源活化利用。落实长江文化资源保护与长江生态景观保护相结合，做好武汉沿江地区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加快把生态资源

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地展现武汉的自然风光、黄金水道与人文历史,规划建设长江国家水文步道^[20]。

第三,加强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统筹长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合作,协同精准发力,推动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融合发展。推动长江文物保护、地方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文旅资源开发协同融合,构建和谐一体的景观格局与环境氛围。

(三) 落实长江文化重大项目,推动武汉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

第一,务实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建设。发挥政策激励作用,统筹谋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段建设的组织管理模式创新、资金保障机制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机制创新和社会参与机制创新,引导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社会资金参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武汉英雄之路、金岸同心路等文化线路及城市徒步线路^[21]。

第二,加快推进中国长江博物馆建设。系统谋划中国长江博物馆及配套博物馆群落建设,加强科技赋能,突出长江主题和武汉地区文化特色,多维度展示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着力打造知名文化地标。同时,推动建立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打造长江流域文博交流合作平台。

第三,建好用好盘龙城、明楚王墓等考古遗址公园。积极推动明楚王墓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具有长江文化内涵的项目的提档升级,努力打造“北有盘龙城、南有九王寝”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格局。规划建设湖泗窑窑考古遗址公园^[22]。

(四) 结合城市文化资源禀赋,助力武汉长江文化创新性发展

第一,发挥区位优势,探索构建长江文化产业带。发挥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长江文化与城市文化产业、市民生活的深度融合,构建以长江沿线为主体,全域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新格局。推进“文化+”“旅游+”“数字+”,通过虚拟现实、交互娱乐、智慧旅游等创新实践,打造新兴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政策扶持,推动招商引资,建设一批商文旅融合集聚区。强化会展和文旅联动,丰富人文经济内涵,构建武汉长江文化产业带。

第二,发挥人才优势,着力打造长江文化高端智库。加强长江文化研究团队建设,健全决策咨询机制,资助并扶持一批高质量研究项目,着眼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为中国长江博物馆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示范区的建设提供顶层设计与实践路径。进一步提升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办会质量,努力将其打造为长江文化研究的“武汉品牌”,让城市长江文化符号更立体鲜明。

第三,结合城市更新,深化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坚持“以文化为导向的策略”^[23]^[21],通过城市更新拓展人文滨江空间,赓续沿江历史文脉。依托重大国家工程、重大考古遗址,打造兼具科研、教育、游憩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以盘龙城、万里茶道、辛亥首义、岳飞在武汉的足迹等特色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为重点,打造具有世界景观标志的城市阳台和仪式空间,策划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活动,提升文化资源的品质和吸引力,打造一批“国家展厅”“长江客厅”。

(五)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创新,树立武汉城市文化品牌形象

第一,进一步提升武汉长江文化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发挥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借助文体会展、节会赛事、影视交流等形式,有计划地进行城市整体营销。积极主动承接国家长江文化国际交

流活动,加强长江主题的武汉文旅国际推广,培育长江文化品牌交流项目。

第二,谋划设计体现长江文化的优质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加强“两江四岸”文化遗产保护,打造“一桥两山”世界级旅游区,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区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持续打造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力的文旅交流合作品牌项目。推动建立长江流域旅游联盟,推出长江旅游一卡通。做大做强“长江灯光秀”“夜上黄鹤楼”“知音号”沉浸式演出等武汉文旅品牌。搭建长江文化普及和研学教育体系。建设荆楚步道、国家人文步道^[24]、长江水文步道^[25]等线性活动空间,规划“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26]。串联盘龙城和郭元咀两大青铜考古遗址,打造青铜文明之路^[27]。

第三,培育打造武汉长江文化IP体系。连通“长江文化主轴、山水人文绿轴”,激活城市各类文化和旅游资源,打造统一的武汉长江文化视觉标识。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开发机制,积极引导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以及个体创作者与粉丝创客共同开发长江文化IP;基于长江文化IP,营造丰富的城市商业文化场景生态体系,以长江文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产业—城市”融合创新发展的闭环。

参考文献

- [1]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 [2] 曹劲松, 汪晓燕, 陈希希. 长江文化发展报告(2023-2024) [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4.
- [3] 张卫东. 文质相炳焕 学向勤中得——访著名城市史专家涂文学教授 [J]. 社会科学动态, 2024(09): 5-19.
- [4] 管菁, 王娟. 黄陂发现武汉地区最早城址 [N]. 长江日报, 2008-11-12.
- [5] 刘辉, 郭长江, 张君, 等. 武汉市黄陂区张西湾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2(08): 42-68+1+106-108.
- [6] 夏鼐. 中国文明的起源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7] 李学勤, 徐吉军. 长江文化史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 [8] 田豆豆.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守护城市之根 传承文明之光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04-02(07).
- [9] 盛伟. 从盘龙城遗址兴废看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的进退 [J]. 四川文物, 2022(04): 49-57.
- [10] 王光艳. 武汉英雄城市精神品格形成与城市形象传播 [J]. 武汉社会科学, 2023(01): 144-153.
- [11] 陈鲲, 章迟. 从城市文化历史与经济发展展望武汉市历史街区文化旅游未来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06): 63-68.
- [12] 张笃勤. 汉水主泓历史上在哪里汇入长江(中) [J]. 武汉文史资料, 2023(11): 37-44.
- [13] 樊树志. 国史十六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4] 王光艳, 李曼西. 论岳飞精神的历史形成与当代传承——以岳飞与武汉为例 [J]. 武汉社会科学, 2022(03): 8-16.
- [15] 阮晶晶. 明代湖北区域商业地理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16] 吴成国, 王秦汉. 江汉关与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以航运交通为中心的考察 [J]. 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1): 89-96.
- [17] 张之恒, 吴建民.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8] 鼓足干劲奋发进取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4-11-07(01).
- [19] 李翠军. 推动武汉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J]. 武汉社会科学, 2023(01): 28-34.

- [20] 王光艳, 周明. 规划长江国家水文步道 赋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J]. 水文化, 2024(10): 61-64.
- [21] 王光艳. 多措并举 让城市漫步更具吸引力 [N]. 中国旅游报, 2024-10-08(03) .
- [22] 王光艳. 论湖泗窑窑址的重大价值、保护现状与开发利用 [J]. 武汉社会科学, 2024(04): 28-36.
- [23] 张雯. 城市更新实践与文化空间生产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 [24] 樊志宏, 王光艳, 陶维兵. 规划建设国家人文步道 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 中国文化报, 2024-03-01(03) .
- [25] 傅才武, 李越. 规划“万里长江第一桥博物馆”, 赋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J]. 武汉社会科学, 2024(02): 1-5.
- [26] 王光艳. 盘龙城与郭元咀的英雄城市精神奠基 [J]. 武汉社会科学, 2026(1): 6-12.

Urban Evolution, Cultural Nourishment, and Value Reconfigu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Tracing: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Culture and Wuhan

Wang Guangy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Wuh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19, China*)

Abstract: Citie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tracing, urban evolution, cultural nourishment, and value reconfiguration constitute the core logic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ivilization. Taking Wuha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its entir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the embryonic urban at the Zhangxiwan and the urban roots at the Panlongche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with the Queyuecheng and Xiakoucheng, the prosperit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during the period when it served as a prefectural capital, and finally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toward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ras. This reveals Wuhan's unique value as a city that has fully witnessed the four-stage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 morphology.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nourishment that the Yangtze River culture has bestowed upon Wuhan: it has not only sustained the inheritance of its millennia-old cultural context and endowed it with an urban spirit of daring to be the first and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but also fostered an inclusive and open mindset, embodied the core of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mutual prosperity of the city and the river. Finally, drawing on the achievements of civilization tracing and Wuhan's 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the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pathways for reshaping Wuhan's urban value from five dimensions: civilization tracing research, systematic protectio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culture 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Yangtze River Culture; Civilization Tracing; Wuhan; Urban Evolution; Cultural Nourishment; Value Reconfiguration